肆、台灣光復後的本堂教務

一.教友重建戰後的家園：

公元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戰敗投降，結束戰爭。十二月廿四日教廷發表田耕莘爲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位樞機主教。25 日台灣光復，教友重整受戰爭破壞殆盡之家園。

公元 1946 年 4 月 5 日，日人里脅監牧，因曾被徵召軍職，被遣送回日本長崎。臨行時將台灣教務委託涂敏正神父代理。涂神父接管後，坐鎮本堂，遂次開始整頓因戰爭而荒廢的傳教事業涂神父處理台灣教務二年，雖用心計劃推動各項傳教事業，但心有餘力不足， 加上戰後環境，不能實現其理想。其間教會當局也無法維持傳教員家庭的溫飽，而准許部份兼職或轉業，使教務受阻。

公元 1948 年 3 月 5 日，陳若瑟神父爲台灣第四任監牧，適時大陸變色，許多傳教士、修女、教友陸續遷台，教會呈現一股活力。又加上美國 捐贈救濟物質，透過天主教福利會在台發放，而吸收不少教友。

公元 1948 年，聖母無原罪方濟傳教修女會於十月被驅逐出境到香港。是年十一月十五日抵台北，請求陳若瑟監牧爲她們在高雄安置居所。陳監牧終於排除萬難，將本堂境內原來的孤兒院改爲小修院院舍的一部份充讓與該修會。

公元 1949 年 1 月 23 日該修女院 (今聖功修女會)南遷駐進孤兒院院址，不多時孤兒院及小修院遷移它處，終將全部院址讓與該修會。

❖公元 1952 年陳若瑟主教有感於傳道員的缺乏，便在本堂開辦了男傳道速成班共招收十二名傳教員，授課期間二年。1960 年又再五塊厝天主堂，原若瑟修院院址，另開一班。其中有平地人和山地人共十二位，至 1962 年畢業時僅剩下九名畢業。

二.在台傳教壹佰週年活動：

公元一九五九年五月十八日天主教在台灣重新開教一百週年，原本只擬在教區內慶祝

，後因陳若瑟主教召集全體道明會士及教友代表開會，討論結果一致任爲在台傳教壹佰週年是件值得慶祝的大事，不僅是高雄教區的喜事，也是全台各教區共同的罄日，因此台灣各教區理應參加，並須舉行隆重盛大的慶典，表現眾教友的信德，以光榮天主。但鑑於各項籌備工作巨細遺糜，需動用相當的人力、物力，故決定延宕至第二年，即改爲一九六 0 年二月五至七日一連三天慶祝。同時決定舉辦以宣傳車傳佈福音、辦展覽會、演講

會、大遊行，並在市立體育館舉行慶典大禮彌撒。

✠.一九六 0 年二 月廿七日，教廷傳信部署理部長雅靜安樞機蒞臨高雄，是日教友數千人聚集本堂，列隊在本堂大馬路旁約兩百公尺，各手持火炬、提燈、並放鞭炮、煙火等，以空前之熱烈歡迎樞機蒞臨。並接受本堂聖母會委員暨教友代表所獻贈純金製成的台灣模型。

✠.同年三月卅一日南京總主教區于斌總主教也蒞臨高雄訪問，當天教友同樣列隊在堂外，各手持國旗並鳴放鞭炮，歡迎中國教會的偉大人物到來。

✠.本堂因是開教發祥地，故而受命組織「慶祝台灣傳教壹佰週年紀念籌備委員會 」，負責開始分組推行工作。發出請柬給全台各教區及高雄監牧區所屬各堂口、男女修會及學校；主教、神長等光臨。陳若瑟主教也親自寫請帖邀請田耕薪莘樞機主教、教廷駐華公使高理耀、于斌總主教、各教區暨各地主教光臨。

✠.慶祝第一天；一九六 0 年二月五日(星期五)

1.上午七時卅分，在開教發祥地玫瑰大堂，恭請于斌總主教奉獻慶祝開幕大禮彌撒。

2.下午三點，台灣百年傳教歷史展覽會，由教廷駐華公使高理耀總主教主持開幕典禮。❖.展覽內容從一六二六年起分爲：

第一部:最初道明會神父在台灣傳教行跡簡介及成果。

第二部：「滿清政府統治時期」。

「日本政府統治時期，教會仍隸屬廈門教區時代」。

「日本政府統治時期，台灣監牧時代」、

「高雄監牧區時代」止。

第二天：二月六日星期六，上午七時卅分，恭請牛會卿主教奉獻大禮彌撒。下午四時，在西甲聖若望堂由光一幸主教主持聖體降福。晚上七點，在體育館舉行第二天演講大會，再由于斌總主教主講。

第三天：二月七日是世紀之慶典的最高潮之喜日，一大早從北、中、南各教區各堂口趕來之一隊隊教友上萬人，穿著五顏六色，漂亮制服之樂隊，裝飾得美麗的花車，陸

續向大會報到。上午九點在本堂由陳若瑟主教奉獻感恩大禮彌撒。下午三點舉行慶祝大遊行，沿街頌唸玫瑰經。在體育場恭請教廷駐華公使高理耀總主教奉獻佰週年紀念大禮彌撒，此台

彌撒不送聖體。彌撒後，恭請郭若石總主教處持聖體降福大禮。

三.傳教人員：

清朝時期天主教傳教人員以西班牙道明會傳教士爲主(參閱表一)。管理玫瑰堂的道明會傳教士，同時須兼管步行約一小時的鼓山天主堂。

日據時代玫瑰堂傳教士還是以西班牙道明會爲主。1941 年以後，由於官方戰略政策上的考量，道明會傳教士皆被迫離開高雄。而教廷方面亦爲便利傳教工作能持續的進行，遂派任日人主教里脅新任臺灣監牧區主教。里脅鑑於高雄無神父駐地，便將監牧辦公室移至高雄。

公元 1945-1948 年間基本傳教人員還是西班牙道明會傳教士。1948 年以後大陸的中、外修會來到高雄後，開始在高雄各地傳教。另一方面，隨著臺灣天主教會生態漸漸由大陸籍神父來接管，道明會漸漸地退出臺灣天主教會之管理階層的同時，也漸漸退出玫瑰堂的管理權。1964 年戴剛德神父是玫瑰堂最後一任本堂，此後道明會傳教士便不曾再管理玫瑰堂，代之爲大陸或本土的神父。

四.傳教情況：

(一)清朝時期

天主教傳教人員以西班牙道明會傳教士爲主（參閱歷任神父網頁）。管理玫瑰堂的道明會傳教士，同時須兼管步行約一小時的鼓山天主堂清朝時代道明會傳教會士在前金的傳教情況，相較整個台灣天主教的傳教過程，可說平靜許多。根據教會紀錄的記載，這時期的傳教工作，主要的阻礙則只有打狗官府的阻撓，但卻未遭遇如臺灣其他地方對於傳教的強烈抗爭。大多只有附近居民對傳教士、信徒零星的辱罵，並無強烈的團體抗爭行爲。

道明會傳教士首先在前金及鄰近地區向當地的居民傳教。其在前金建立傳教據點後，除本身親自下鄉傳教外，也派遣傳教員前往附近傳教。平日每晚由傳教士主持彌撒、講道，傳教士如果不在，則由傳教員帶領信徒念經、講道，維持信仰生活。另一方面道明會也在前金地區購買大片土地，部份信徒在受洗後，也在教會的建議下遷住教堂附近，同時教堂也將土地租與信徒及非信徒種植農作。教會如此的作法也多少吸引了

一些信徒。傳教士們除繼續在鄰近地區傳教外他們亦經常拜訪信徒家庭，與信徒們維持緊密的關係。

（13）

滿清時代開教進展

台灣南部	一八六Ｏ年萬金	一八六二年山腳	一八六四年溝仔墘	一八六六年台南
	一八七Ｏ年老埤	一八八一年五塊厝		
台灣中部	一八七五年羅厝(竹子腳)	一八七六年沙崙仔	一八七九年埔姜崙	一八八二年斗六
	一八九二年斗南等開教			
台灣北部	一八八七年在和尚洲(今之蘆洲)	一八八八年台北大稻埕	一八九Ｏ年淡水。	

(二)日據時代

日軍來到臺灣，各地的抗爭造成臺灣社會短暫混亂，但卻也造成了臺灣部份地區天主教堂遭受仇教居民的破壞。但前金玫瑰堂在此時卻未遭遇任何的破壞或仇教行爲。

(上圖：李安斯神父與教友合影)

個日據時代前金玫瑰堂的傳教狀況，方可說是很順利的。整個時期並無任何仇教的事情情，但多少仍存在著部份當地居民口出穢言辱罵信徒的情形。玫瑰堂此時亦同時兼管鼓山、五塊厝天主堂。

日據時代玫瑰堂傳教士還是以西班牙道明會爲主，(請參閱歷任神父網頁)還有來自菲律賓的聖道明傳教修女會來台協助傳教工作，玫瑰堂孤兒院便是由道明會修女負責管理。

日據時代男傳教員方面有高井、菊田(管理日本信徒的教務)，女傳教員方面則有廖鶯及黃蜜兩位協助堂務及教授要理。

(1)高雄女傳道養成所

男傳道員對一般婦人之求道者，都盡量避免直接教授道理。但是如果家庭主婦不是教友，而要引導其全家族成爲教友，坦自說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爲一位家庭主婦對外雖不能代表她家族。但在家族內卻有其一定的影響力量。因此若要引導全家信教，必先引導其主婦有堅固的信仰，才能收到完善的傳教效果，所以教會當局便開辦女傳道學校，以方便爲家庭主婦的傳教工作。因此當時在教務方面，有一個很重大的突破，就是成立「女傳道養成所」(高雄女傳道學校)。

（14）

教會在 1921 年正式開辦第一屆女傳道養成所，經過四年之訓練與教育，有七名學成畢業，各奉派前往各地教會傳教。1926 年~1937 年造就十多名女傳道。共計三屆所培養出來的去傳道員，在台灣的傳教史上，都是貢獻莫大的無名英雌。在台灣傳教史上，稱呼女傳道爲「姑婆」
或「姑」：她們乃是一生過獨身生活，專爲從事傳教工作之女士，她們雖然沒有發守貞誓願，
但堅守貞德，一生完全奉獻給教會，在世俗中奮勇推行傳教工作，鞏固教友家庭信仰等，頗受
教友的敬佩。在本堂服務貢獻頗多頗頗的鐘稻姑即當時第三屆培養出其中之一。

女傳道學校學員與管理修女合影

女傳道學員在教堂合影

（15）

第三屆女傳道養成所學員與李神父合影。李安斯神父與女傳道員合影。

右穿西裝者爲當時傳道員李庭飛，坐於第一排左前者，即爲陳主連先生。

～．❖～❖～❖～❖～❖～❖～❖～❖～❖～❖～❖～❖～．

公元 1933 年本堂熱心有志的教友們，爲協助教會推行各種傳教活動，成立了**男青年會**。顧問爲陳主連、鐘同國、會長鐘同加，副會長，林耀榮，幹事由菊田及加勇田二擔任。

1934 年 7 月李庭飛　先生學成返回家園，在本堂擔任傳教員兼孤兒院書記。他就職先行訪問教友家庭，作成教友名冊並整理兒童要理班等。

同年本堂又成立女子青年會，會長鐘量，副會長黃廖菊，同時制定男女青年會團體服裝，以求團體的整齊。男女青年除定期研判道理外，並負責聖堂的清潔工作，每逢慶節還的擔任招待，並維持聖堂內外秩序。

李安斯神父與姑婆及穿著團服的女青年會員合影。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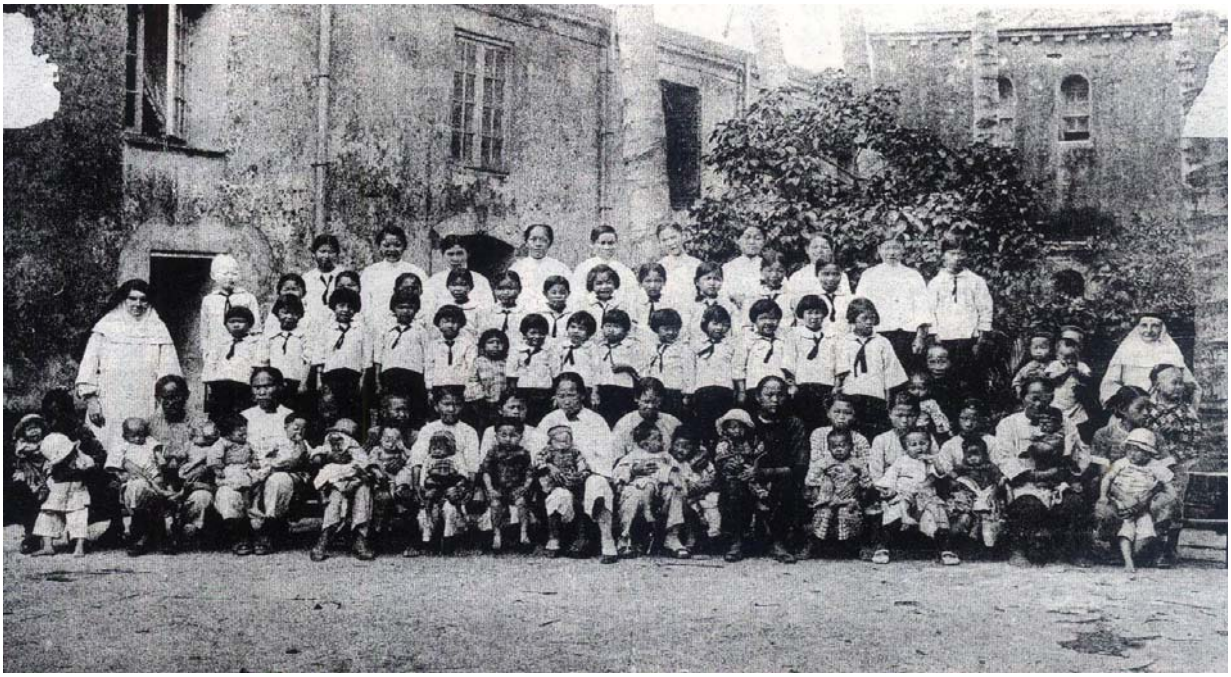
(2)高雄孤兒院

1866 年，郭神父派遣嚴味超傳道員以廿伍圓在台南租了一間房屋，做爲臨時收容所，開始收容孤兒。昔日被郭德剛神父所拯救之六十多名孤兒，於 1868 年當台南臨時聖堂及孤兒院被火災燒毀後，不得不全部寄託在教友家庭，並將台南孤兒院遷至高雄。後來，郭德剛神父向本國教會求助。他們對此事非常同情，立刻組織後援會，而於 1879 年獲得了法國巴黎孤兒救濟會里昂支會之支助，獲得年額五百圓之補助金，才能繼續維持。

◎ 1885~1939 年間所收容之孤兒計 1333 名。

在高雄設立孤兒院之初，院舍是利用神父宿舍一部份房屋，其後另建神父宿舍後，便將原將原神父宿舍全部撥出充爲孤兒院。然經過一段時期，該院舍

年久腐朽，所以於公元 1939 年，再耗資二萬參仟餘圓重新興建二層樓房之孤兒院，使用至 1949 年。該院自 1903 年起，由聖道明傳教修女會接管。教育方面，院方也相當努力費神，於 1914 年爲充實計，按孤兒之長成年齡，安排日本修女與台灣修女擔任教育職務，除宗教教育外，也注意社會知能教育，教授公民、國語、漢文、算術、裁縫及手藝等一般課程，並與一般學校同樣制定時間授課，且將智能較好之孤兒送往公立學校就讀。



(上圖高雄孤兒院全體院童和乳母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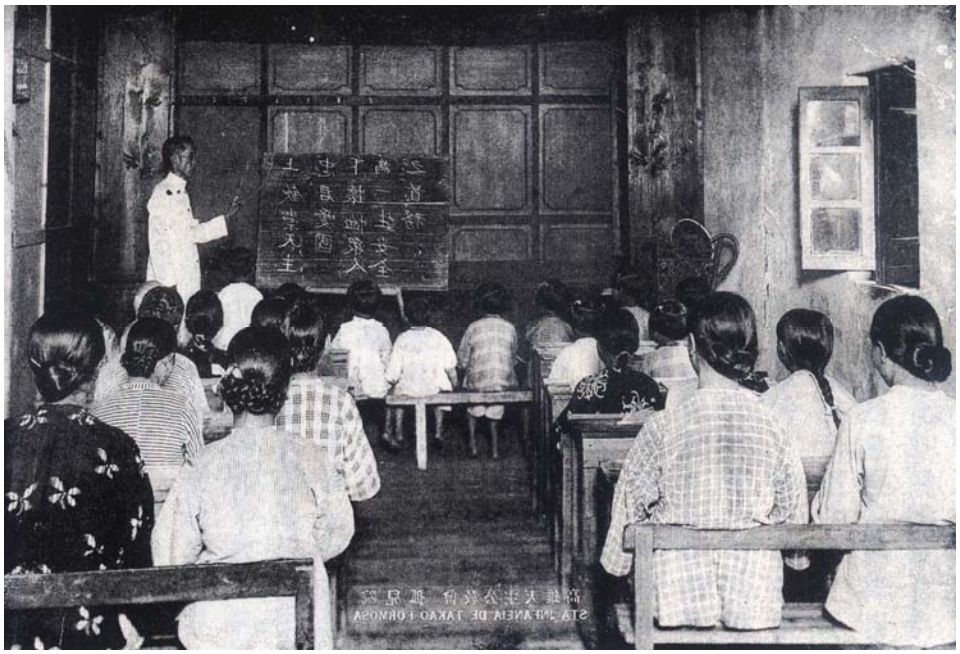
（17）

在高雄設立孤兒院之初，院舍是利用神父宿舍一部份房屋，其後另建神父宿舍後，便將原神父宿舍全部撥出充爲孤兒院。然經過一段

時期，該院舍年久腐朽，所以於公元 1939 年，再耗資二萬參仟餘圓重新興建二層樓房之孤兒院，使用至 1949 年。該院自 1903 年起，由聖道明傳教修女會接管。

(上圖院舍是利用神父宿舍一部份房屋)

教育方面，院方也相當努力費神，於 1914 年爲充實計，按孤兒之長成年齡，安排日本修女



與台灣修女擔任教育職務，除宗教教育外，也注意社會知能教育，教授公民、國語、漢文、算術、裁縫及手藝等一般課程，並與一般學校同樣制定時間授課，且將智能較好之孤兒送往公立學校就讀。所收養之孤兒一律姓「受」，即「聖教會的孩子」。孤兒可以說都是女性，長大後，其中少數志願爲女傳道(姑婆) ，奉獻終身於教會做會救靈工作者外，其餘即尋覓適當良緣讓她們結婚。

(▲孤兒院教授漢文情況，由當時傳教員高井先生執教)

該孤兒院曾蒙受日本帝國宮內省之御賜金。並獲得台灣總督府、高雄州廳、大正救濟會、明治救濟會，慶福會，台灣社會事業協會，愛國婦人會及其他社會慈善機構之援助，延至公元 1937 年 7 月 7 日，中日戰爭開始以後，1943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致經濟來源中斷，無法再繼續收容新孤兒。

延至台灣光復後，涂敏正神父代表里脇監牧時，因得美援救濟物質，便將

高雄孤兒院重整，但經辦不理想。公元 1949 年(民國三八年)，將還留在院內之少數孤兒送至羅厝孤兒院分院，而結束高雄孤兒院八十有五載之克難奮鬥光榮歷史。

（18）

(三)戰後

(1).李安斯神父籌建玫瑰聖母大堂

日據時代玫瑰堂經歷了一較大的變化，即再次重新建築新教堂。玫瑰堂在道明會士用心的傳教、管理、培育下，經半世紀後，教友人數逐漸增加，原有的聖堂已難容納來參與主日彌撒的教友友，每逢瞻禮慶典日，更是肩摩踵接，於是有了重建聖堂的計劃。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李安斯神父(EliasFenandez,1899-1956)擔任本堂時，開始籌備第二次興建「玫瑰聖母堂」(以下簡稱本堂)。此次建堂的工程由興建台北樺山町天主堂的營造商負責，經費方面由主教支助少許外，大多是信徒的捐獻。

(2).建堂的艱辛

日據時代玫瑰堂經歷了一較大的變化，鑑於教友漸增，公元 1928 年道明會傳教士李安斯神父決定重建，並委由日本長崎營造商承攬建造。經費高達五萬圓以上，其中楊多默主教捐四仟元，李安斯神父捐二仟五佰元，其餘則動用成立多年公教進行會的基金及信眾一生積蓄的捐出，或分期付款湊足。當時本堂所在地和愛河的沙灘連在一起，地勢非常低窪，必須填滿五尺的砂土，才能達到建堂的地坪，而重建的工程所需經費極為龐大，除了能募到的款項外，同時也協議每一戶教友家庭，各自分擔一

段地域，負責將該地域填至規定的高度。李神父也請求政府許可，把當時開通愛河的泥土搬來填充地基。經政府同意後，全體教友便日夜趕工靠著自己的力量，有錢出錢，有力
出力，歷經二年的時間，終於在一九三一年(民國廿年)夏季完成了宏大的建堂工程。這座高
26.88 公尺，建坪約 180 坪西洋哥德式建築的教堂新建完成，成爲當時台灣最大的教堂。

（19）

戰後玫瑰堂外觀未有太大的變化，只有幾次零星的修復工程。較大規模之整建工程，則是在公元 1995 年的大幅修建，雖然外觀仍維持原貌。實質結構已由原來的石造木構改變爲鋼筋水泥。

玫瑰堂的環境也由以前最明顯高聳的建築，隨著周圍高樓陸續興建，已將玫瑰堂的尖頂鐘樓遮住了。又因拓寬五福路填高路基，玫瑰堂的地面也隨著填高有 70、80 公分，似乎有理在土中的感覺。同時周邊的建築陸續興建，交通也日漸繁忙，已非往昔寂靜、空曠的環境。

聖堂採哥德式(Gothic styls)建築，鐘樓高聳於碧空，兩旁另有兩座拱門，側面爲圓拱窗；堂內天花板富有變化的圓拱型突出裝飾線條，使聖堂在靜穆氣氛中多一份活潑氣息。

整座教堂矗立在愛河橋旁真是壯觀，爲當時台灣首座大天主堂，即使現在，依然爲全台最大的主教座堂，更在 2001 年榮獲文建會舉辦全台灣歷史建築百景第一名。

雖說本堂現今全仍是全台最大的主教座堂，但自峻工啓用經過六十幾載都未曾舉行盛大的落成典禮，因本堂全部工程峻工時，大部份教友都已經耗盡他們所有的積蓄，所以不敢舉行落成典禮的慶祝大會，因已無能力再負擔。本堂在台灣傳教史上，是唯一沒有舉行過正式落成慶典的大聖堂，可是本堂教友完全憑藉自己的力量。興建自己的大堂，在台灣的傳教史上，也是空前的壯舉。

直到 1998 年 11 月 8 日才舉行落成祝聖典禮。新玫瑰堂雖興建完成，但舊玫瑰堂仍保留著，　並未立刻拆除。新教堂四周亦仍是空礦、低窪的土地，並無種植任何植物與信徒的築家建築，與旁邊舊教堂的茂爲盛植物成對比。

聖堂內由兩排住部列柱區分成巴西利卡三廊式建

（21）

▲▼雄偉的玫瑰堂側面建築圖

(3).教友重建戰後的家園：

公元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戰敗投降，結束戰爭。十二月廿四日教廷發表田耕莘爲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位樞機主教。25 日台灣光復，教友重整受戰爭破壞殆盡之家園。

公元 1946 年 4 月 5 日，日人里脇監牧，因曾被徵召軍職，被遣送回日本長崎。臨行時將台灣教務委託涂敏正神父代理。涂神父接管後，坐鎮本堂，遂次開始整頓因戰爭而荒廢的傳教事業，涂神父處理台灣教務二年，雖用心計劃推動各項傳教事業，但心有餘力不足，加上戰後環境，終不能實現其理想。其間教會當局也無法維持傳教員家庭的溫飽，而准許部份兼職或轉業，使教務受阻。公元 1948 年 3 月 5 日，陳若瑟神父爲台灣第四任監牧，他當時乃是道明會玫瑰省台灣區會長他於同年五月六日在木堂舉行就職典禮，陳若瑟神父任台灣監牧後，便指定本堂爲主教座堂迄今。

（22）

公元 1945-1948 年間基本傳教人員還是西班牙道明會傳教士，許多大陸的中、外傳教士修女、教友陸續遷台後，教會呈現一股活力。陳主教得此生力軍更加活躍，將他(她)們安頓在台灣各地教會，協助傳教工作。又加上美國捐贈救濟物質，透過天主教福利會在台發放，因此，很多從來不曾到過教會不認識天主教的民眾，也漸漸的親近教會，並了解教會的善意及博愛的精神，一般百姓對教會越來越表好感，而且對教義也開始感興趣，教會藉此機會，上下一心致力於推行傳教工作，於是慕道者如雨後春筍，日漸增加，受阻的教務也隨之露出曙光，教務發展呈現蓬勃朝氣。

大陸遷移至台灣的傳教士急遽增加，教廷傳信部鑒於情勢的需要，並爲了更積極傳教，於1949 年 12 月 30 日，宣佈將台灣監牧區劃分爲高雄、台北兩監牧區，高雄監牧區仍由，陳若瑟神父繼續擔任。台灣監牧區自 1913 年 7 月 19 日成立，到 1949 年 12 月 30 日劃分教區爲止。共經過三十六年又五個多月。

另一方面，隨著臺灣天主教會生態漸漸由大陸籍神父來接管，道明會漸漸地退出臺灣天主教會之管理階層的同時，也漸漸退出玫瑰堂的管理權。1964 年戴剛德擔玫瑰堂本堂神父結束，道明會傳教士便不曾再管理玫瑰堂，代之爲大陸或本土的神父。(參閱歷任神父網頁)，另創新教區。

1945 年日本戰敗，臺灣由國民政府接管。日人主教里脅遣返日本，其缺由涂敏正代理。1948 年涂敏正辭職，由道明會傳教士陳若瑟接任監牧區主教，其仍選擇玫瑰堂爲辦公室，亦指定玫瑰堂爲主教座堂。

1949 年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大陸人民也大量跟隨來台，使臺灣的人口激增。中國大陸的中外修會也在此時來到臺灣，使得臺灣傳教人員大增，同時來到高雄的中外修會亦開始漸漸在各地區進行傳教工作，建立傳教據點。

受洗信徒方面，1950 年代爲一個高潮。據說當時每個月都有許多人前來受洗成爲信徒，可說是非常的熱鬧。因爲信徒人數太多，使原本在日據時代已因信徒增加而新建的教堂又有不勝容 納之感。後來遣使會傳教士在鼓山地區又新建教堂，即今高雄市建國四路天主堂，多數的外省信徒便改到此教堂禮拜。1950 年代的高峰期過後，玫瑰堂的受洗人數大幅下降，這樣的情形可說與整個臺灣天主教的發展有相同的因素存在。

另外這時期最顯著的就是信徒團體的陸續成立，使整個傳教方式呈現多元化的形式，如教友傳教協進會、聖母軍、學生青年會、職工青年會……等。同時當地的信徒參與率。所以此時之傳教方式已非往昔傳教士單向的講授，而轉向爲信徒本身自發性的維持信仰及參與教務。

另一方面，1960 年代以後玫瑰堂也漸因著教會事務的增加、信徒的增多及神職人員的缺乏，神父已無閒最拜訪信徒或到鄰近地區傳教，使神父與信徒間熱絡的聯繫漸漸疏遠。

戰後至今擔任玫瑰堂之傳教員有李庭飛、陳欽明、許貞茂、鐘乾、方安東、鍾欽章、周方章、李安寶、白明前、潘瓊英、潘松浦、任明源。